

从发展主义到均衡社会

——兼析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取向

□ 袁富华

[摘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时产生的两大现代化理念是发展主义和均衡社会。发展主义在理论上重视经济社会过程协调,但受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初始条件的制约,实践上倾向于增长和效率优先。均衡社会作为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标志,它的基础是福特主义催生出的福利国家体制,实践上倾向于效率/福利的动态平衡,并被视为高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已经突破传统发展主义框架,由新发展理念塑造的均衡社会正在成为中国城市化阶段高质量发展的取向。

[关键词]发展主义 均衡社会 规范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012 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22)01-0023-10

[作者简介]袁富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引言

本文旨在澄清关于发展问题的一些模糊认识。第一,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理念之一,发展主义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现代化要求,传统发展主义的目标是实现持续快速增长,倾向于社会整体联系中的效率方面,这种合理性由不发达的初始条件所决定,尽快突破贫困陷阱并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是其内在要求。因此,发展主义是现代化的一种过渡理念。第二,对社会发展的重视以及效率/福利动态平衡,属于均衡社会的规范理念,并成为工业化后期发展可持续的内在要求。均衡社会有各种称呼——新发展观、规范社会、平等社会或福利社会等等,典型特征是重视人的发展,社会价值的引入也被经典社会理论视为均衡的主要标志。因此,均衡的含义是在内稳态和发生学结构主义意义上理解的,不是通常的机械均衡含义。第三,国家/市场关系上,新老发展主义关注国家“嵌入自主”的重

要性,即国家嵌入社会而不是相互分离或相互对立,均衡社会中,“嵌入自主”体现在“国家—市场—家庭”的福利组合以及各种不同的福利国家模式之中。因此,应该在总体的、综合的角度上理解国家作用。第四,现代化的线性趋势与现代化的模式多样性是相互结合的,亦即特定国家现代化所遵循的一般发展规律,体现在其具体、特殊道路之中。特殊性由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社会价值塑造,提供了现代化模式的根本支撑。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以及共同富裕这个更高目标的提出,中国现代化已经突破传统发展主义框架,在更加综合、平衡的发展理念下朝向新发展阶段迈进,因此理解均衡社会的本质及其路径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发展主义·工业化探索的理论遗产

(一)作为现代化理论重要分支的发展主义理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沿着两条

收稿日期 2022-01-05

泾渭分明的主线展开：一条是后发国家摆脱贫贫困恶性循环、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主义理念，与之对应的是发展型国家建设；另一条是发达国家缓和工业化风险、维持均衡发展的规范主义理念，与之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建设。两种探索均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盛极一时，其后，针对后发国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失衡，新发展主义开始关注一体化问题，经济社会均衡协调逐步纳入发展实践。鉴于国际分工“中心—外围”格局的客观存在，后发国家将工业化追赶作为战略目标是完全合理的，因此，理论和实践上选取发达国家作为参照有其合理性，这也是欧美学者热衷于推荐线性现代化机制的重要原因。现代化的线性成长、线性发生或线性演进理念，广泛分布在经济、历史、社会、政治等学科领域，典型如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传统 / 现代二分法，将美国视为社会进步的唯一范本；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赞同所有成熟社会向美国生活风格收敛；日本产业雁阵理论不仅关注效率这个核心的线性升级动力，而且关注产业结构合理化。实际上，线性升级属于发生学结构主义的范畴，尽管发展涉及多种经济社会因素，但是从发生发展次序这个角度考虑，工业化初期优先关注经济增长符合事物发展规律。

反对现代化线性演化的声音，最早来自研究拉美发展经验的学者，特别是与上述线性现代化理论几乎同时产生的拉美学派。拉美学派聚焦于现实问题的特殊性以及克服发展障碍的急迫性，因此不太关注线性现代化的遥远图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Prebisch (1970) 的经典定义：发展主义可以解释为相信不需要大的变革就能加速当前的发展步伐，并确信社会不平等将会在发展的强大动力中逐步消除，重要的是发展。理论上，拉美发展主义试图从一种综合的战略角度，给出动员经济社会潜力的建议，重视生产性活动或工业发展在减少贫困方面的作用，主张兼顾资本积累与就业吸收，以此促进国民收入、需求、社会公平的改善。与此类似，基于商业资本主义至产业资本主义、再至金融资本主义这个更加广阔的历史视角，Reinert (2010) 提出了如下认识：与新古典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理想模型不同，发展主义把次优的国民生产结构作为其认识问题的核心，为此，

促进技术升级、规模经济、结构多样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政策必不可少，国家或政府的作用因此成为发展主义的一部分。概言之，发展主义旨在运用国家在规划和政策方面的积极作用，动员社会资源以突破贫困恶性循环，直至最终实现工业化。

(二) 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

应当客观地认识线性现代化路径，它假定克服了潜在障碍之后，发展过程表现出来某种持续的、普遍的成长规律；同时，也应当客观评价非线性现代化路径，它假定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均具有各自的制度特殊性，发展过程表现出来多样性。因此，即使是作为追赶标杆的发达国家，其现代化一般也包含收敛与多样性这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工业化的技术、经济结构的发生次序是作为一般的、普遍的现代化趋势存在的，标示着后发国家经济追赶方向，尽管追赶过程中可能发生个别产业超过发达国家的弯道超车现象。这是由生产技术规律决定的，也是在发展理论中得到普遍承认的。其二，对于线性现代化理论的最大争议来自资本积累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文化价值模式，非线性观点认为这与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历史、文化和制度的路径依赖相关，“美国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不具有普世性。这是由社会价值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决定的，多样的现代化模式也主要由这种因素促成。

对于上述两点，这里提供一些补充说明。第一，生产技术上的线性演化直至较高发展阶段上的效率和消费水平的收敛假设。按照 Rose & Shiratori (1986) 的说法，我们处于一个人们期望相差不大的世界，无论你生活在欧洲，还是生活在日本或是美国，对诸如健康、教育、高收入等“好东西”的向往心理是普遍的。这种社会需求可看作现代化过程收敛可能性的深层动力。第二，东亚追赶经验为线性发展和收敛假设提供了佐证，典型如日本产业雁阵理论。按照 Ozawa (2005) 的论述，日本用了 40 年的压缩时间，走完了通向发达国家的所有工业化阶梯，通过观察英国霸权主导的工业化和美国主导的工业化，绘制了自己的飞翔地图，开发了自己的飞翔工具（技术和市场），开拓了自己的发展愿景。这个清晰的线性升级路径是：劳动驱动—规模驱动—装配线驱动—研发驱动—IT 驱动。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日

本就开始自觉植入知识创新的内生动力，家电的自主研发成为创新和可持续增长的弹射器。第三，现代化模式多样性理论要归功于调节主义与福利国家理论在历史、制度和规范方面作出的系统分析。与传统发展理论中普遍关注的技术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不同，第一代调节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积累体制中的社会决定因素给出了系统分析，恰是这种研究视角的转换，为文化、制度差异所导致的模式多样性分析开启了大门。在此基础上，第二代调节主义针对金融体制、劳资关系、市场竞争体制、国家体制、国际关系之不同组合所决定的总体积累体制在各国的差异，给出了更加具体而深入的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福利国家理论，把分析重点放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交叉点上，更加注重由各国社会文化价值规范差异和社会权利构造方式差异所决定的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并将效率改进隐含在福利国家体制建设和调整之中。

受到制度依赖的影响，后发国家现代化呈现出来的模式多样性中有一类特殊的非线性——“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术语是在比较东亚、拉美等地区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并把拉美作为没能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样本，原因在于发展过程中缺乏东亚那样的规模经济。与 Prebisch 不同的地方在于，Gill and Kharas (2007)在这个术语中强调由创新、规模经济所引致的激进变化的重要性，这一点上与 Ozawa 的认识相同。需要注意的是，“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在于拉美有其历史特殊性，特别是土地所有权过度集中所引致的一系列不可持续问题，对此 Kay (1989)、布尔默—托马斯(2000)分别从拉美思想史、经济史角度给出了精彩分析。

(三)国家的“嵌入性自主”

与发展主义概念相对应的是发展型国家概念，后者包含了一个重要含义，即如何认识国家或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相关文献倾向于把发展型国家概念的首次提出回溯至约翰逊(2010)对日本工业化历程的经验考察和理论归纳，包括四个要素：一个小而精干的官僚队伍；一套提高官僚体系治理效能的政治制度；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国家干预方式；一个具备规划和综合协调能力的导航机构，如通产省。^⑩实际上，东亚国家的快速工业化和稳定发展为

重新认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工业化过程中国家的主导作用也被这种成功实践所支持，约翰逊使用“绝对优先权(first priority)”这一术语强调发展过程中国家作为变革权威的作用。发展型国家的权威之源不是韦伯意义上的传统型权威或理性合法型权威或魅力型权威，而是致力于社会、政治、经济秩序转型的权威。概言之，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于国家发展目标的成就，而不是拥有权力的途径。^⑫相比较而言，在国家之于发展的主导作用方面，本文更加倾向于“嵌入性自主”的国家理论。^⑬实际上，这个理论是对韦伯“自主”的官僚体制思想的修正，“嵌入性自主”主张政府作为一种组织，只能存在于社会网络之中，一系列网络联系把国家与社会结合在一起，为公共目标、发展政策的持续协商提供制度渠道。

国家的“嵌入性自主”首先旨在明晰具有预见性、高效能的官僚机构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关注发展而非发达这一特殊状态中的国家作用，正如 Evans (1992) 在综述早期发展理论(如格申克龙、赫希曼的观点)时所指出的那样：后发国家所需技术、资本超出私人在市场上的积累能力，需要国家动员全社会资源。^⑭为此，国家可以积极参与、组织市场活动的一些关键方面，如通过先行资本和投资决策克服发展瓶颈、分担风险、培育企业家精神。其次，国家的“嵌入性自主”这一概念中，嵌入具有重要性，这是相对于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的威权主义后果而言的。这方面，米格代尔(2013)有过非常有见地的分析：拉美研究的相关文献强调国家的威权主义性质，国家并不只是通过与利益集团协商来保持社会和平，也不是简单地对其授权或将其整合到政策制定机构以保证稳定的工业调整。拉美政权组建甚至重塑利益群体，并在经济增长中维护陈腐的精英统治体系，因此，这些国家中人民利益和政治参与被压缩、分配需求被忽视，只有经济增长的最大化和迅速的工业化被优先考虑。^⑮最后，正如 Reinert (2010) 所说的那样，发展型国家只是过渡，因此，为了推动现代化向更高阶段升级演化，政府机构的功能、干预的内容以及政策目标必然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作出相应调整。或者更加明晰地说，不仅是经济与社会结构在一个持续的现代化追赶过程中表现出向高级形态的收敛性，国

家治理体制也在不断合理化，并呈现出 Johnson (1999) 所谓从发展型国家向规范国家、平等国家、福利国家的演进。后发国家在工业化后期这种高度现代化的均衡取向正是下文分析的内容。

二、均衡社会 经济社会一体化

(一)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主义

用社会决定论矫正技术决定论所造成的偏差，追求经济与社会发展协调。发展主义理论通常将东亚成功经验和拉美失败经验进行对比，并将后者作为由于长期忽视社会发展而最终导致经济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在其关于拉美经济历史和拉美经济思想史的系统研究中，江时学(1996)指出拉美发展主义的主要问题，在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未能或者无力进行制度变革，片面追求资本密集技术而忽视劳动力的利用，片面追求经济效率而无力纠正收入分配不公平，最终导致宏观不稳定。^⑯对于这种现象，佩鲁(1987)有一个指称——“无发展的增长”，即经济活动集中于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和重大的公共事业，且未产生全国范围效果，发展利益分布不平衡，由此引发不同阶层或群体的冲突。^⑰因此，在工业化快速增长时期，受到各种因素制约，后发国家不像发达国家所做的那样，在制度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以社会保障或一般转移支付的形式，在国家层次上建立完善的安全和团结网络。

实际上，发展实践中偏向于经济增长和技术决定的普遍做法及其不可持续的后果，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便已被不少人觉察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9 年基多会议精神，佩鲁系统阐释了一种新发展主义，即总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发展观。这种观念继承了传统发展理论中的经济社会协调推进的合理思想，但是更加明确倡议把发展建立在“以人为中心”的基础上：(1)嵌入性的总体发展。市场是为人而设置的，而不是相反；工业属于世界，而不是世界属于工业，如果资源分配和劳动产品需要一个合法基础的话，即使在经济学方面，也应依据“以人为中心”。(2)多样性的内生发展。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文化价值是抑制或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各国应注重自己的文化价

值体系，探索自己的道路，反对经济主义，反对普世文化。(3)协调性的综合发展。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任务是使全体居民自觉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来生活，提高社会凝聚力，改进和加强各种组织机构，提高政府效能，建立先进市场体系。

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主义，以及总体性、内生性和综合性理念指导下现代化模式多样性的探索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越来越多体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和实践之中。典型如作为发展主义和新发展主义理念的发源地，巴西在 1988 年联邦宪法中作出建设福利国家的政治承诺，实质性的社会发展进程由此启动，这种努力尽管在其后的自由化浪潮中受到抵制，但是以欧洲社会福利模式为榜样而非以美国自由模式为样本，注重“社会保护和社会对话”建设的努力依然存在。^⑱与此同时，正如新发展主义的积极倡导者 Bresser-Pereira (2017) 所建议的那样：应当重新认识国家在增长、稳定与联合方面的积极作用，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黄金时代“社会—发展型资本主义”是更好的平衡形式，规范、公正、协调是国家积极追求的目标。

(二)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经济社会均衡

“社会—发展型资本主义”这一术语把我们引向现代化探索的另一条道路，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建设。它在两个方面与后发国家的发展主义有着本质不同：一是理论上更加重视运用社会价值或人的发展，矫正技术决定论或经济主义导致的发展失衡；二是实践上更加重视社会权利规范及其完善，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见证了发达国家公共服务支出的快速拉升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成熟。这种平衡由福特主义工业化的投资/消费良性循环提供，按照这个时期声誉日隆的结构功能主义或规范功能主义的思想，发达国家“社会—发展型资本主义”更宜称为“均衡社会”。

法国调节主义学派用了两代的努力，对发达资本主义的转型机制和模式多样化成因给出了最为直观、精致的解读。^⑲不同于新古典均衡研究方法及其经济决定论，第一代法国调节主义集中于分析社会结构再生产对于积累过程的影响，带有鲜明的整体论和社会决定论色彩。这种理论将制度互补性作为研究的根本任务，据此理解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及

其转型。为此设置的具有重大理论启发性的问题如：什么力量推动了社会系统变革且保证其长期凝聚力？这种具有凝聚力的形态和条件是演化的吗？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如何识别、资本主义危机如何解释？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第一代调节主义把劳资关系置于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及其转型的决定作用作为研究焦点，将福特主义这种大规模生产组织原则视为生产方式的飞跃，第一次深入劳资关系内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思想的深刻性具体表现在其制度互补性的分析之中，福特主义相互联系的几个制度层面或“结构形式”是：集体讨价还价保障工资弹性和消费增长；社会保障系统维持失业者的消费能力；大公司的投资竞争促进生产条件更新；金融系统促进货币流动。这些国内制度的相互作用加之国际竞争的冲击，推动了发达资本主义现代化升级：从泰勒制到福特主义再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新福特主义。第二代调节主义更加注重福特主义模式在各国表现的差异性或资本主义模式多样性分析，继承了第一代调节主义“结构形式”的制度互补思想，聚焦于发达国家历史和文化路径依赖所导致的制度组合方式的多样性。^{②0}模式多样性理论的贡献在于深化了现代化道路的理解，对于后发国家具有特别的启发意义。

两代调节主义理论均主张均衡发展中的现代化，其中最核心的洞见在于：福特主义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创造了工人阶级的消费模式，把一般化了的商品关系扩展至消费领域，逆转了传统生活方式。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创造了标准化的大众消费方式，并以此为条件达成更高程度的现代化。^{②1}

（三）均衡社会的规范主义内涵与均衡机制

需要注意的是，发展主义视野中的均衡概念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机械均衡，而是一种发生学意义上的内稳态概念，这种观念不仅体现在佩鲁的新发展观上，而且更加清晰地表述在帕森斯的规范主义理论之中。这种均衡概念的使用，显然受到了皮亚杰发生学结构主义的影响，更早可追溯到坎农的内稳态理论。^{②2}根据坎农的理论，有机体内部环境的稳定是这样一种动态平衡或发展机制：如果一种状态得到稳定，那么出于任何变动的趋势都将自动增强一个或数个因素对抗这种变动，决定一种稳态状况的

调节系统可以包括若干起着协调作用的因子，这些因子能同时或连续参与作用。内稳态的作用首先是维持系统的生存，以此为基础，使得有机体摆脱内外部环境的限制，进而从事复杂的认知活动。个体和群体的演化过程中，内部稳定能力和外部环境适应能力都是随着机体发生、成长而逐步提高的。坎农把这种思想扩展到社会科学，尝试建立一个普遍的稳态原则：社会系统最初的结构和功能是简单的，内部稳定性机制不健全，应对外部冲击能力低下。随着分工深化和实践经验累积，灵活协调的社会调节机制产生，这种平衡有助于社会活力和个体发展的良性循环。

由此可以发现，注重结构功能分析的发展主义之所以重视内稳态意义上的动态平衡，主要出于社会价值因素的考虑。或者说，从发展观点来看，均衡社会的形成是这样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技术分工推动了社会网络的扩大，且日益需要更多的规则用于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平衡。这方面特别典型的例子是公民权利的充实或福利社会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基本权利形成于 18 世纪，政治权利形成于 19 世纪，社会权利形成于 20 世纪。以此为基础，福利国家理论甚至认为，当代福利国家不只是工业化过程中的被动的副产品，制度化的福利国家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化机制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谓制度化、社会化，正是自帕森斯以来的规范主义所关注的社会均衡发展的内容。按照这种理论，社会均衡的重要问题集中于以下方面^{②3}：第一，从功能角度看，社会进步的标志表现为分工程度的深化、适应能力的提高，为满足这个要求，需要更大包容性、广泛共享性的社会价值文化。这是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动态发展过程，目标、适应、整合、维持是经济社会整体及其子系统均衡的必要条件。第二，系统整合能力居于社会均衡的核心。随着系统分化或社会分工复杂性增加，子系统之间以及子系统内部与外部环境的协调和相互适应需要一系列权责规范，特别是法律规范和管理程序的完善。第三，整合的最终目的在于社会保存和进步。包括两个方面：制度化意义上，保持各类社会价值体系的稳定，即以共享的文化和信仰维护社会凝聚力；社会化意义上，个体通过遵守规范将社会价值内化在人格的

发展之中。社会维持或者价值分享机制成为现代化模式多样性的源泉,它的变化也是社会变迁和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

前述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制度互补及其调节方式可视为抽象均衡理论的一种应用。这种实质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于制度规则在现代化过程及其转型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重视。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均衡社会的规范化特征在福利国家理论那里得到了更加直观的说明。这种理论继承了波兰尼经济嵌入社会的思想,主张社会保护之于效率/福利长期平衡的重要性,因此,这种理论中社会权利的制度化以及“国家—家庭—市场”福利组合的建设成为高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就20世纪80年代拉美新发展主义的主张及其社会保护实践而言,这种社会权利和规范意义上的社会均衡的可行性、必要性实际上已经引起后发国家的重视。类似地,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经济社会一体化动态平衡的思路。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主义特征与均衡社会取向

(一)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发展主义共性与特殊性

“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社会共识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大潮,自此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旋律,这一方面受到国际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上层制度变革愿望的推动,因此,中国的工业化无疑带有鲜明的发展主义色彩。^②但是,一些研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遵循的是一种新发展主义模式,当然,这种认识是对比日本传统发展主义模式下的经济政策所得出的,与本文的均衡和规范视角有所不同。^③本文首先分析一下中国现代化的共性与特殊性,也为一些现实问题分析作个铺垫。

共性方面。第一,“嵌入性自主”的国家或社会中的国家作用,正如追赶成功的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构成了中国持续高增长和稳定的基础。按照丁学良的见解,东亚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特的国家/社会关系是历史形成的,不会因为工业化或民主化而消失,与西方正当程序关系模式不同,东亚地区国家的影响是弥散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交织,国家与市场交织,法律与道德交织等。^④中国式的“嵌入性

自主”的国家/社会关系,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的效能上,其重要成果就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并成为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指导。按照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理论的解释,“嵌入性自主”的本质是“公共对话领域”的建设,其重要作用在于扩大社会参与网络,以便在关系到长远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凝聚团结力量,因此也是一种综合的、前瞻性的且有利于政策连续性的制度设计。第二,稳定、持续的高速增长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强劲的追赶趋势。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日本用了40年的时间走完了通向发达国家的所有工业化路程,类似地,中国也用了近40年时间经历了劳动密集型、重化工业化阶段,且在增速换挡时期,适时作出了高质量发展的长远规划。第三,从经济社会一体化角度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自觉地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推动均衡社会建设,中国均衡社会发展的愿景——共享、包容、普惠、平衡等理念进一步得到落实。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理念也使得中国现代化内容更加丰富,特别是对于稳定发展至关重要的发展权利的重视。^⑤从而均衡社会的价值取向与经济高质量取向的一体化协同出现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效率/福利的动态平衡逐渐成为发展主线。

特殊性方面。第一,正如高柏(2006)指出的那样,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两者看待市场的态度和制度安排不同。日本模式适应了全球化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第二次浪潮,一开始就采取了限制市场力量和社会保护策略。中国的改革开放适逢全球化第二次浪潮的市场力量释放时期,逐渐走上要素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第二,改革开放之初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其提升为系统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

(二)高增长、科学发展观与均衡发展路径的探索

就现代化过程中人的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深化

而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人民发展权利为标志，这里大致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历程分为两个历史时期，即1978年至2011年的高增长时期，或称效率主导发展时期，因此带有传统发展主义注重增长数量和增长速度的典型特征。2012年以来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转换，以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意味着中国进入一个效率/公平的动态平衡时期，公平正义背后的社会权利和人的发展受到重视，带有规范主义的均衡社会色彩。为清晰见，本文使用苗遂奇(2021)的研究方法，以历次党代会作为重要时间坐标，首先针对中国高增长时期的发展理论和均衡努力给出扼要说明。^②以党的十六大(2002年)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节点，中国高增长历史又可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2001年，实现了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深度融合于国际经济的飞跃。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稳定持续高增长的工业化路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国家与市场关系方面，党的十四大(1992年)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宏观调控方面，理论认识和调控体系在实践中发展起来，尽管这个时期的五次调控仍然是针对短期的总量调控，但是已经认识到结构性问题的重要性^③；经济结构方面，这个时期成功突破“低水平收入陷阱”，经济高增长动力由劳动密集型主导转换为重化工业化主导，同时，城市化开始快速发展。第二阶段是2002—2011年，这个10年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在于，首次明确、系统地将均衡发展理念用于指导现代化过程，为以后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基础。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即在20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更高水平的小康，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繁荣和谐。党的十七大(2007年)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科学发展观概念，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均衡理念因此得到系统表述。

总体来看，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以人为本理念的确立，是适应城市化加速

发展的一次关键、主动的战略调整，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于切实把社会发展的价值揭示出来，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成功探索。这种理念背后的原因也颇具历史意义和耐人寻味，这里扼要提示两点：第一，城市化的发展进一步凸显了结构问题，需要一种总体的、内生的、综合的科学发展观从全局上把握与调节。1981年城市化率为20%，城市化率突破30%(1996年)历时15年，突破40%(2003年)历时7年，2011年城市化率突破50%。这个过程中，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快速发展，最为突出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化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根据郑功成(2012)的研究，党的十六大之后，国家逐渐改变社会保障为市场经济改革配套的过渡性做法，在将保障扩展至农村居民的同时，推动了向公平本质的回应；2010年《社会保险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入法制化轨道。^④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建设一方面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新要求，另一方面打下了未来稳定发展的基础。第二，加入WTO后，中国进入新一轮资本驱动的高速增长阶段，投资/消费失衡问题愈演愈烈，居民消费率在2005年以后更是降低到40%以下。其间，扭转这种失衡局面、顺应城市化规律把增长动力逐渐转换到内需拉动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弥补社会发展短板相应成为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

(三)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和共同富裕 均衡发展路径的确立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同时，随着城市化由加速走向成熟，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和共同富裕的提出标志着发展新时代均衡现代化路径的确立。

本文这里结合均衡社会的几个发展前提，对近10年来中国现代化理论探索中的主要创新——尤其是这些创新背后的深层次理论意义给出扼要提示。^⑤首先介绍一些思想背景。回顾前文Bresser-Pereira(2017)的发展阶段划分，发达资本主义在经历了福特主义的“社会—发展型资本主义”之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经济脱嵌所导致的后果越来越严重，以致于乌尔里希·贝

克在其影响甚广的《风险社会》一书中，直接将现代性定义为风险社会，即传统工业社会的财富生产分配逻辑蜕变为当代社会的风险生产分配逻辑，以社会价值回归消解发展失衡的呼声日渐高涨。由此看来，中国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有着深层次的国际国内背景。总括起来，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最终体现在共同富裕目标之中。

从均衡社会角度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经济层面：以人民为中心和人的全面发展，抓住了城市化的根本特征。2012年以来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城市化向成熟期迈进的同时，产生了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高质量、内生性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新的要求；国际上，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使其成为重塑国际分工体系的重要力量，贸易摩擦、疫情以及未来不确定性，促使中国调整原有工业化思路，转换到更加有弹性的平衡路径上来。以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确立为主线，开启了城市化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探索。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2015年）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到党的十九大（2017年）关于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战略判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真正确立起来。“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是将新发展理念用于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由此，规划中不断出现的均衡理念，被赋予了包括经济结构协调、国内外协调、经济社会一体化等更加具体而丰富的内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成为未来均衡布局的关键。

社会层面：正如前文所述，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落实更多体现在“国家—市场（企业）—家庭”福利组合的相互嵌入或一体化协调之中，各国根据自己独特的文化、制度建立不同的效率/福利动态平衡路径。有几个关键要点：一是知识中产群体的扩大再生产，中产群体的培育是发展中国家保持社会活力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这个群体的重要作用是充当消费结构升级和生产结构升级良性循环的枢纽，是

企业家精神和社会凝聚力的源泉。二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现代化与保障制度完善反映了工业化后期高端城市化可持续的要求，体现了社会生活、道德、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性，也是现代化成果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这方面着力较大，且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以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上日程。三是在向发达国家迈进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发展环境比过去更加严峻，特别是老龄化、服务化和城市化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归根到底要依靠创新能力的提高解决。由此，人的发展的重要性就不难理解了。

政治层面：治理的效率和效能。更多社会目标的纳入，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工业化过程中围绕效率、供给等相对简单的发展目标不同，均衡社会的有效运作依赖于面向市场和公共生活的更大水平的开放与政策权衡。2021年写入国家法律的“全过程民主”是中国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按照鲁品越（2021）的解释，在提高治理科学性方面，“全过程民主通过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的统一，作出充分集中体现民意与民智的科学决策。党和政府在决策过程中，由党和政府提出决策需求，向人民开门问策，通过专家咨询、智库研究、群众献策、网络征集意见等各种民主形式，充分听取民意、集中民智，使尽可能多的民众参与决策过程”^②。虑及上文提及的城市化时期经济社会一体化问题的复杂性，这种积极的嵌入型治理网络的构建有助于社会均衡路径的达成。

结语

发达国家经历了从重商主义到工业革命的漫长发展过程之后，随着福特主义在美国的兴盛及其向全球的扩展，造就了20世纪60年代效率/福利动态平衡的黄金时期。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新自由主义和去管制化，属于后福特主义时期发达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一系列调整，尽管发生了金融资本和脱实向虚的偏向，但是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的力量一直在发生重要缓冲作用。事实上，发达国家经历了黄金时期公共支出水平迅速提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化的完善之后，1980年以来不像以前增长的那么

快了,但是社会保护力度也没有显著降低。同时,这次疫情给自由主义信条敲响了警钟,重新恢复均衡社会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稳定快速增长势头的保持,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探索,特别是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随着城市化日益走向成熟,均衡协调越来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是包括了经济社会政治等相互嵌入的更复杂的逻辑框架,只能是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的开放模式。尽管如此,对社会价值的重视,以公平促进未来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或者说实现效率/福利的动态平衡,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注释:

参见 Parsons T. *The Social System* [M]. London: Routledge, 1951/1991. 以及 Rostow W. 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主义极盛时期的比较政治学,也产生了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影响很大的一些命题,典型如李普塞特的著名命题“发展带来民主”,围绕这个线性思路的争论深化了后续民主/发展关系的探讨,且在本文参引的发展主义“国家中心论”中多有体现。比较政治学中的发展主义文献,具体参见曾毅.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发展主义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11(1).

Prebisch R. *Change and Development: Latin America's Great Task* [M].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1970. 这里征引了高君成(1985)对这个定义的中文表述。高君成.评拉美发展主义的经济理论及其实践[J].*拉丁美洲丛刊*,1985(2).

Reinert E. S. *Developmentalism* [J]. Other Canon Foundation & Tallin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orking Papers in Technology Governance & Economic Dynamics, 2010.

^⑦Rose R. & Shiratori R. *The Welfare State East and West*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4-10,131.

Ozawa T. *Institutions,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Japan: The “Flying-Geese”*

Paradigm of Catch-up Growth [M]. Cheltenham and MA: Edward Elgar, 2005 :139.

袁富华、李兆辰.嵌入、调节与治理:历史时间与现代化路径[J].*经济与管理评论*,2021(2).

调节主义和福利国家理论源于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并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拓展至后发国家分析。对于二战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总体趋势,Bresser-Pereira(2017)将其称为“社会—发展型资本主义”,这个术语也注重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内涵。但是,按照规范主义理论传统,称之为均衡社会似乎更为妥当,具体分析参见下文。Bresser-Pereira L. C. *The Two Forms of Capitalism: Developmentalism and Economic Liberalism*[J]. *Brazi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7, 37(4).

Gill I., Kharas H., Bhattachari D., et al.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J].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7, 22(2).

Kay C. *Latin American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M]. London: Routledge, 1989: 197—227.

[英]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著,张凡等译.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363—370.

^⑪[美]查默斯·约翰逊著,金毅等译.*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Bresser-Pereira (2017)认为,巴西学者在1960年代就开始使用发展主义概念了。Bresser-Pereira L. C. *The Two Forms of Capitalism: Developmentalism and Economic Liberalism* [J]. *Brazi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7, 37 (4).

^{⑫⑯}Johnson C.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Odyssey of a Concept* [A]Woo-Cumings M. *The Developmental State*[C].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⑬参见Evans (1992)和Evans & Stephens (1988)。Evans P. & Stephens J. D. *Studying Development Since the Sixties*[J]. *Theory and Society*, 1988, 17(5).

^⑭Evans P. *The State as Problem and Solution: Predation, Embedded Autonomy, and Structural Change*[A]. Haggard S. & Kaufman R. R. *The Politics of Econom-*

ic Adjustment [C].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38-181.

⑯[美]乔尔·S·米格代尔著 李杨、郭一聪译.社会中的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 211—213.

⑰江时学.拉美发展模式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6 262—281.

⑱[法]弗朗索瓦·佩鲁著 张宁、丰子义译.新发展观 [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15、91.

⑲Kleber C. Cerqueir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Developmentalism[C]24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o-Economics - SASE. 2012.

⑳关于法国调节主义思想的具体介绍,具体参见袁富华、李兆辰(2021)。袁富华、李兆辰.嵌入、调节与治理:历史时间与现代化路径[J].经济与管理评论, 2021(2).调节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福特主义的分析,显然与葛兰西(1983)一脉相承。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383—417.调节主义理论中的社会决定论,也明显受到了阿尔都塞 (2019)“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的影响。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M].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 397—433.

㉑Aglietta M.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Experience[M]. England: Verso, 2015:109—141.

㉒类似的思想体现在加尔布雷斯(2012)的“修订后的顺序”这一表述中,即与消费者统治相反,消费者行为被公司广告、说服策略控制,更严重的是,为使

生产扩张持续下去,产生了生产体系对消费体系的控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新工业国[M].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203—222.

㉓[法]皮亚杰著,倪连生、王琳译.结构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美]坎农著,范岳年、魏有仁译.躯体的智慧[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74—186.

㉔Parsons T. An Outline of the Social System[A]// Calhoun C.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 [C].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㉕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发展主义特征的分析,参见叶敬忠、孙睿昕(2012)的系统综述。叶敬忠、孙睿昕.发展主义研究综述[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2).

㉖高柏.新发展主义与古典发展主义[J].社会学研究 2006(1).

㉗苗遂奇.从百年历程看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的历史意义[J].党建 2021(7).

㉘汪同三.历次宏观调控的回顾与反思[J].瞭望新闻周刊 2005(27).

㉙郑功成、鲁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社会保障[Z].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项目 2012.

㉚袁富华.集聚的现代性与均衡社会的准则[J].经济思想史学刊 2021(4).

㉛鲁品越.全过程民主:人类民主政治的新形态[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1).

责任编辑:陆焱